

英雄城市的现代教育接力

——读《珞珈筑记：一座近代国立大学新校园的诞生》

王启元

这本书在最近读来，你会依稀感受到书中隐含的武汉这座城市中的苍茫与激昂，这种倔强的气质激励着几代人不断接力，把现代高等教育的旗帜，牢牢扎在珞珈东湖之上

武汉无疑是最近一段时间来众人目光的焦点之一。无论是疫情防控的一场场硬仗、各地医疗队的逆行驰援，还是普通人的克制与互助，甚至确定不移盛开的樱花，都牵动了国人以及世界的心。终南山院士在采访中说：武汉本来就是一个英雄的城市。这不禁启发我在这个特殊的当下去了解这座“英雄城市”的历史和文化，也想进一步思考，是怎样的过往塑造了这个城市的英雄气息。

有一本去年下半年面世的好书，《珞珈筑记：一座近代国立大学新校园的诞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作者刘文祥，2019年6月），未必不适合在现在这个时刻翻阅一下。这是一本关于武汉的书。对全国人民来说，武汉不仅有抗疫第一线的诸多英雄故事、有长江大桥、有热干面和樱花，也有很多值得被提起的历史与空间。

《珞珈筑记》由作者的博士论文修改而成，全书关注武汉最重要的一所高等学府武汉大学的校园建筑与校史沿革，尤其在围绕民国时期武汉大学校园建筑的设计与建设的论述上用力最勤，不啻为一部“懂建筑的文化史”或者“有文化的建筑史”。作者虽然是一位人文科学者，但书中并不拘泥于人物、典章、本事的考察，对建筑史与建筑学同样涉猎不浅，书中有大段篇幅回顾了西方人的东方建筑观与近代中国建筑风格，比如第一章“中西建筑文化交流与晚清民初大学校园发展历程”，足见作者的学术眼光。同时，全书对于地方空间有意识的考察，看得出作者对武汉大学、对武汉这座城市的关注与稔熟。学者身份之外，作者平时一定也是位有心人，对自己生活的校园与城市关注有加，否则就不会对清末武汉地区学校校址位置及武大选址过程，如此信手拈来（见全书第一章第四节“清末民初武汉高等学堂、学校的校园建设”及第二章第三节“珞珈山新校舍的选址过程”）。同时，作为毕业于斯、工作与斯的武大人，作者对于母校的款款深情与自豪，无疑可以从其字里行间深刻感受到。

这只需要从精心设计的腰封及其上“你如果要看中国怎样进步、可以去到武昌看看珞珈山武汉大学”一语中，便能窥见一二了。

作为思想承载的空间

作为空间的学校对人的教育，远远大于课堂与课程的教育；不过很多时候大家并没意识到这条道理的意义——直到今年初开学，师生们开启了网课、上学过程跳过了“学校”空间而只剩下“课程”之后，不同学校、年龄段的师生似乎感到了一种相似的对于校园的渴望。无法身临学校的具体空间，似乎更令人想念那份面对面求学从教的真实感。也许，过完这阵特殊时期，很大一部分师生会对“课堂”二字有更深的体会，也可能会更爱自己的学校。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晚清民国时期的校园之于先生与学生们。对一所学校而言，空间的因素对于置身其中的人们来说，其影响当不逊色于所谓的学风、精神或言论的滋养。书摊上对大学精神、大师课堂作抽象理想解读的作品早已多如牛毛，其中不乏把民国大学与精神囫圇混为一谈，对民国大学的风骨、精神也不乏隔空的想象。但是，那些出自校园的所谓“精神”本是理想抽象之物，必须有所依托，才能呈现其具体的样貌；大学精神所依托的，则为其学校校园空间，而园中建筑则尤其重要。反之，满眼只有精神、而无校园与建筑的大学史、教育史，仿佛佛家“放眼无相，心见实相”。所以，书中作者一句自谦的话，我看反而非常重要，他说当今有关近代中国大学史的学术成果已经很多，题如“民国大学那些事儿”或是建筑文化类“老洋房往事”之类书早就泛滥成灾的时候，这本《珞珈筑记》“仍有其自身价值”。当然，站在读者的角度，我确实能体会到这层意义。

此书研究最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作者于文献研究时，同时注重大小空间的转移与布局；



李四光(左)似曾选小洪山南麓为武汉大学建校之址，而最终由日后武汉大学农学院院长叶雅各(右)选址珞珈山下东湖畔。

“大空间”是武汉大学及其学校的变迁、变革历史与武汉这座城市的关系，“小空间”则是珞珈山上校园内建筑的分布；而这些空间的考量及其背后的取舍，也包含了时代、人事等各种因缘。

清末开始武汉的高等学堂的创办，不仅留下了丰富的教育遗产，也在武汉三镇城市空间中，刻上浓重的一笔。作者从推行“湖北新政”下张之洞主持所建“自强学堂”的校舍辗转，显示晚清新学堂的出现，开始与旧有城市格局产生不可调和的冲突。在张之洞改“自强”为“方言学堂”后，校址几经辗转，来到武昌阅马厂东的原农务学堂校舍，而把这里的原主人赶出了城，去到武昌北门武胜门外宝积庵重建。但这里的校舍状况，仍让清廷学部觉得不甚理想，讲堂逼仄，自习室不够，没有图书室。情况稍好的是另一所由蛇山北三道街经心书院改建的存古学堂。经心书院是张之洞早年出任湖北学政时所建的一所传统书院，院址屡有变迁；其咸同年间的都司湖旧址，于二十世纪初改建为著名的两湖高等学堂及后来的两湖总师范学堂。湖滨一带虽几经变迁，但今日沿岸仍是武汉重要的教学用地。

民国后筹办武昌高师时，教育部委派袁希涛司长赴武昌，最初选中的正是都司湖边的两湖高等学堂旧址，但因湖北教育当局于此地早有打算，建两湖总师范学堂，袁希涛只能挑下了马厂

东的方言学校旧址；日后其地办学之辛苦无奈与乏善可陈，也在所难免，正如作者所言，北洋政府时期湖北办学甚至比清末更加不如人意，清末尚有多所张之洞新政下诞生的较成规模的新学堂，民初竟未再新办一所官办学校。最要命的是所有国立、省立高校，全是在前清旧舍中艰难维系，从空间的角度来看，湖北教育长期都无法突破晚清张之洞的布局；空间如此，学术当亦不远。至于作者时时拿来比较的全国同期其余城市的学校建设成果，不论北京、上海、南京，即便广州、郑州、厦门等在新学建设中都广有出彩之处，甚至那时的建筑遗产，今天依然惠及当代学子。

北伐前后到国民政府时代，武昌高师在经历建制上的合并、更名以及“大学院”改革尝试，终于走到了筹建武汉大学时刻，这时学校的选址再一次把目光从马厂东，投到十余年前相中的都司湖畔。不过这一次最终否决的人物，是时任武大建委会委员长的李四光，他的选项是武昌城外的洪山附近，其南麓为武汉地标场所宝通寺。作者考证宝通寺东南、小洪山南麓，很可能就是李四光相中的建校之址，但因为各种不妥当，1928年夏天再次被否决。最终促成珞珈山下东湖畔的武大校址，是日后武汉大学农学院院长的叶雅各所选，大约就是那年的秋天。

自晚清新政以来的武汉诸

校，在旧城内外及山间湖畔的生根受挫，最终破茧发展，这与整个中国近代学校发展是相似的。晚清以来开创的包括高等学校在内的新式学堂，多因循城市中旧式书院、学宫、贡院、衙署建筑改建，早期如山西大学堂（今太原理工）、三江师范（今东南大学）及前述“自强学堂”，有些甚至由“庙产兴学”之风而于儒释道宗教空间办学如马神庙中办学的北大、李公祠里的复旦，以及被张之洞迁去宝积庵的农务学堂。这些早期新学的于空间唯一的优点是位置靠近市中心，但其空间逼仄，房屋也不适合新式学科，其中不合时宜可想而知。受到传教士及开明士绅于远离闹市办学兴校思路的影响，二十世纪初开始的学校建设，渐渐将教育空间向城市的边缘扩张，这种扩张无疑是基于一定交通保障的尝试，似乎也没有一家民国大学真的开进了乡村、大山之中。当年，晚清内务府同意将北京城北十里外的清华园，拨给游美学务处作为留美预备学校，是因为那里有条大路可以直通西直门，二十多年后司徒雷登选择将燕京大学建在那附近，也有相似的考虑。复旦李登辉选择江湾、袁希涛迁同济于吴淞，也是考虑有淞沪铁路可通市区，李四光、叶雅各选中珞珈山同样也不是那里风景殊胜，同样有地理和交通的考量。这里有从武昌东门襄阳门至卓刀泉的公路，而珞珈山于湖边群山，最为靠近洪山与市区。不过经由设计师美国人开尔斯实地走访后，选址再次北移东湖边丘陵半岛。

武汉大学校园的设计者们

今天美丽的武大校园并非生俱来的，李四光、叶雅各、王世杰、夏斗寅等人的回忆中这里曾经是荒山一片，可之后的一代代可爱的武大先驱者，凭空营建了这里优美神圣的学堂空间。

（下转8版）➔